学术专论

中俄边界积案交涉与《恰克图条约》修订

乔卫星

[摘要] 受平定准噶尔之役影响，在缺少弹压以及边防空虚的情况下，喀尔喀车臣汗部贝子颜楚布多尔济属下齐木齐格特人，即俄文资料中的昌加基尔族通古斯盗匪，1752年之后于额尔古纳河库克多波以东未设卡伦之处兴起，频繁盗窃俄方卡伦，至1756年大肆抢劫中俄边境，招致俄属乃玛尔人越界劫掠以为报复。清朝虽在1757年平定了盗贼，但边民互盗与匪帮劫掠引起的积案是否同时抵销，中俄始终未能议决。1768年双方抵销积案并重拟《恰克图条约》第十条，为边务交涉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法律基础。此外，双方还增设了边界卡伦并加强防务，中方将地方层面交涉纳入国家层面的监管，部分地解决了《恰克图条约》的不完善性。

[关键词] 中俄边界积案 《恰克图条约》 齐木齐格特 乃玛尔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2－0102－014

雍正六年（1728）《恰克图条约》签署之后，边民互盗事件仍不断发生。由于缺乏证据、存在分歧或未及时会办等原因，若干案件留为悬案无法解决，满、蒙文资料中称“特古斯肯”事务，对应俄文档案中提到的积案或未解决的边界案件。① 除普通边民互盗引起的积案外，乾隆十七年（1752）之后，俄文资料中身份为“昌加基尔族通古斯人”的“蒙古武装盗贼”，即满、汉文资料中的“齐木齐格特人”于额尔古纳河沿岸库克多波以东未设卡伦之处兴起，越界劫掠案件显著增多。乾隆二十一年，该群体大规模越界盗窃俄方卡伦，招致俄属乃玛尔人越界劫掠以为报复。中方在乾隆二十二年平定盗匪并加强边界防御后，越界劫掠、盗窃案件逐渐消失。但因边民互盗与匪帮盗窃引起的积案相互交织，中俄始终未能议决积案抵销问题。至乾隆三十三年恰克图谈判，在俄方答复抵销全部积案的条件下，双方重新拟定《恰克图条约》第十条，从严管属人，边界头目指交踪迹时秉公作速完结，对越界之人进行治罪三个方面对盗案处理做出详细规定。“这条新外交条款，使边界线的状况趋于改善”，② 之后再未发生大规模越界盗窃事件。先行研究中，1728—1768年之间的积案纠纷只是作为中俄1768年恰克图谈判或第一次恰克图闭关背景提及，缺乏对边界盗窃、积案形成原因，地方与国家层面关于盗窃与积案交涉

[收稿日期] 2024－07－29
[作者简介] 乔卫星（1993— ），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广州510275，qiaoweixing@ucass.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早期中俄关系史（1912年前）”（24&ZD303）阶段性成果。

① 特古斯肯，蒙语完结、终了之意（满语义同），中俄交涉中指双方会办历年未结案例，以下简称积案交涉。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2卷（1736—1776），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55页注释2。

②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2卷，徐滨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0页。

过程的考察，[①] 除瓦西里耶夫（А.П.Васильев）著作外，均未注意到“武装盗贼”的存在。[②] 本文结合满、俄、蒙文档案与传统史料，在考察 1728 年之后色楞格斯克与额尔古纳河地区盗案频发与积案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分析积案交涉过程与纠纷，以期推进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

一、色楞格斯克地区边民互盗与积案交涉

《恰克图条约》签署后，边民越界、盗窃案件仍不断发生。瓦西里耶夫提到，“随着边界的划定，外贝加尔的生活出现了新现象：异族人的越界和边境偷盗”。[③]《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记载：

> 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还未来得及离开中国边界，最初似乎是维护和平条约的蒙古人就成了条约的破坏者。这些蒙古人凶暴地进入俄国属民和布里亚特属民居住的地方，多次赶走马匹，其中有些人还游牧到俄国境内，猎捕野兽，造成一片混乱。关于这件事，边界事务总管布霍利茨上校曾向蒙古王公提出控告。虽然蒙古王公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但为了维护条约的尊严，蒙古王公不得不尽力设法捉拿罪犯并予以惩处。[④]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条约签署后，蒙古边民越界纠纷之根源在于划界时原属喀尔喀蒙古，尤其是车臣汗部的土地被划给了俄国，“按照条约，应该把俄国臣民所占据的土地与中国臣民的蒙古卡伦之间的无人空地平均一分为二，但通过我（伊万·格拉祖诺夫，И.И Глазунов）的努力，这些土地不但没有一分为二，而且整条边界都划在紧靠蒙古卡伦和界标的地方。用这样的办法，大量土地被划到了俄国一边，它们原先都不属于俄国。”[⑤] 恰克图以东地区沿着“原来并非为划界用的，而是为了制止逃人等不法行为”[⑥] 的卡伦线进行划界，导致车臣汗部游牧空间受到挤压，因此越界事件频发，而俄方巡逻官则要“每年轮回巡逻，以使边界线不致消失，使蒙古人不致在空旷的俄国地区放牧”。[⑦]

边界盗窃不仅是地方层面，即布霍利茨（И.Д.Бухольц）上校与蒙古王公交涉的重要内容，因俄方认为中方边务人员办事不公，遂于国家层面交涉中提出抗议。满文档案载，雍正八年，俄枢密院（萨纳特衙门）来文称“中国边界地方办事之台吉等官员，当发生马驼等牲畜盗案时，皆不照所定和好之约公平处理，致使俄罗斯人受害至深。此节想必中国大博格德汗并不知情。请大臣等将此情由转奏大博格德汗。经奏报后，大博格德汗必将按所定之约严行晓谕边界长官”，要求中

---

① 关于中俄交涉中的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问题，参见陈开科：《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从刻本史料看同治年间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陈开科：《嘉庆中俄中段边境防务体系及边境地方层面的双边交往——以嘉庆十年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前后为中心的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 年第 4 期。平等条约时期（1689—1851）中俄交涉中亦存在“层面”问题，《恰克图条约》第六款规定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王丹津多尔济与俄边境城镇长官彼此行文，“此乃为使边界偷盗逃亡等区区小事，不至久搁，作速了结，并未言及边界长官可承办两国大事之处”，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1 卷（1653—1735），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801 页。

② 参见 Курц Б.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сношения в XVI, XVII и XVIII столетиях. Харьк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краины, 1929. С.97、98；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297 页；明骥：《中俄关系史》上册，三民书局，2006 年，第 287 页；李齐芳：《中俄关系史》，联经出版社，2000 年，第 106、107 页；郦永庆、宿丰林：《乾隆年间恰克图贸易三次闭关辨析》，《历史档案》1983 年第 3 期；柳泽明：《1768 年の「キャフタ條約追加條項」をめぐる清とロシアの交渉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 62 卷第 3 号，2003 年。瓦西里耶夫的研究缺乏对中方资料的征引，亦未论及中俄国家层面围绕积案展开的交涉及相关纠纷，详见本文第二节。

③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57 页。

④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91 页。

⑤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III. 1727−1729 / Отв. Ред. 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6.С.413.

⑥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III.С.232.

⑦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40 页。

方在国家层面对地方层面盗案处理进行监督。理藩院回复："库伦地方若有偷窃马驼之事，应陈告原由，由我库伦地方办事之喀尔喀汗、王办理完结。其中确有偏护徇私之处，亦应陈告该喀尔喀汗、王等办理。今文内所报情由并不详明。由此看来显系无踪无影之事。"①《恰克图条约》签署之后，喀尔喀蒙古与俄国边民之间的盗案交涉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按照条约第六款，边界盗案由地方层面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王丹津多尔济与俄边界长官进行交涉，中方之回复并无不当，但因缺乏国家层面的监督，地方层面交涉中条约条款如何公正执行的问题并未得到切实解决。

1736 年，在俄国商队抵达北京之前，托博尔斯克省长布图尔林（Бутурлинъ）委派波列茨基（Порецкий）大尉交还蒙古逃人，并在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两地与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长官共同审理边界积案。② 俄国之所以在交还逃人时提出积案交涉，是因为中俄双方关于逃人与盗案的认识以及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中方认为"万事皆应分轻重大小，逃人及国界兹事体大"，③ 而按照条约规定，盗案属地方层面交涉的范畴。"中国朝廷对俄方未交还（全部）逃民极为不满，乃是意料中的事情。但如果俄方交还了逃人，中国朝廷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他们就会下令将其他一些微不足道的要求搁置下来，不予追究"；④ 俄方正是以国家层面中的逃人交涉作为条件，要求审理地方层面中被视为"微不足道"的积案。此动机则在于俄方认为己方损失更多，中方应按照条约规定进行赔偿。

就此次交涉来看，双方提交、解决以及遗留案件数量大致相同。俄方却认为中方遗留的悬案是"尚未查实的诬告事件"，"很多控告都是毫无道理的"，⑤ 但其也承认这些案件在事实层面上因缺乏证据而难以处理，"特别是那些有争执的案件都是私人之间的纠纷，都是边境居民早年所为，已成为过去的事情，现在未必能够找到充分的证据进行审理，以至圆满了结"，因此外务委员会要求，"我方最好也对本国属民的要求保持缄默，不要再提及"。但在将来进行交涉时，"应严格注意，在审查和处理此类案件时，中方满足俄国属民多少要求，俄国界务官也应同样满足中国属民多少要求"。⑥ 在此原则指导下，1739、1743 年，中俄双方两度派人在恰克图举行交涉，但未能完全议结积案。⑦1745 年前后，伊尔库茨克公署多次给外务委员会呈文，其中提到：

> 蒙古人经常偷越国境，抢劫俄国人和异族人的马群，使他们遭受巨大的无法忍受的损失，甚至彻底破产；还说，蒙古官员在接到俄方的指控以后，对于上述盗窃案件并未作任何令人满意的处置；还报告说，根据色楞格斯克城防司令官雅科比的报告，这类盗窃案件和其他事端以后又发生了多起。⑧

在盗案增多以及俄方认为交涉未取得进展的背景下，雅科比（В.В.Якоби）为阻止牲畜被盗，于 1746 年下令在色楞格斯克边界树立栅栏。"偷盗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但是"后来'栅栏'长期成为争执的对象。中国人断言：俄国人用栅栏强占了中国领土，并要求拆毁栅栏。俄国人则不肯让步"。⑨1759—1768 年，拆除边界栅栏与取消恰克图征税、抵销积案成为中方要求俄方做出答复的三件事宜。茹科夫（Е.М.Жуков）指出，"边界争端的起因是由于条约的不同文本有一些小的出入"。⑩1768 年恰克图交涉中，俄全权大使"克罗波托夫（И.И. Кропотов）承

---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1 卷，第 765 页。

②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266、267 页。

③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III. С.140.

④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68 页。

⑤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67 页。

⑥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68 页。

⑦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79 页。

⑧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82 页。

⑨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81 页。

⑩ Жуков Е.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Книга 1. С конца XVI в. до 1917 г. 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73.С.296.

认《恰克图条约》文本存在不准确之处，未坚持保留该地区原有旧边界线，同意拆除部分旧边界标志并将其移至新的位置”。[①] 树栅纠纷由设栅地点引起，但此行为却与边界盗案增多有关。色楞格斯克地区边民互盗虽因树栅有所减少，但其后额尔古纳河沿岸未设卡伦之处盗匪越界劫掠事件逐渐发展起来，使积案交涉情况更为复杂。

二、额尔古纳河沿岸盗匪劫掠与积案交涉

乾隆二十一、二十二年，中俄边界盗案频发。将俄萨纳特衙门开列的“清属蒙古人抢掠俄人牲畜物资清单”与瓦西里耶夫征引之西伯利亚档案加以对比，[②] 可以清楚发现，此阶段俄文资料中提到的“蒙古武装盗贼”（Монголь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воров）与“蒙古强盗”（Монгольских разбойников）并非普通蒙古边民，而是特指额尔古纳河沿岸形成的“匪帮”，其身份为“昌加基尔族通古斯人”，即《清实录》与满文档案中提到的车臣汗部所属“齐木齐格特人”，为巴尔虎的重要分支。据俄文资料记载，自 1752 年始，该群体在额尔古纳河沿岸频繁越界盗窃，至 1756 年大肆劫掠中俄边界卡伦，[③] 招致俄属乃玛尔人越界劫掠以为报复。以下结合中俄两方面的资料，考察匪帮身份、起源以及越界劫掠的基本情况，进而梳理 1752—1756 年中俄围绕盗匪劫掠与积案展开的交涉。

关于匪帮的身份，瓦西里耶夫提到：

> 在涅尔琴斯克边界上，形成了两伙强盗。一伙是昌加基尔族人（Одна Чамчатирская），在宰桑希杰伊（Шитея）率领下在距基尔德康河克喇卡伦十俄里的鄂嫩河上游游牧。他有四个兀卢思（游牧村），每个村有八十个蒙古包，共约四百人。另一伙叫做“哈腊希里克”（黑旗队）（Харацирикъ Черный отряъ），由达兰贝子（Даланъ–Бесу）领导，是由一些从卡伦逃出的章京和扎兰，即哨所的头目组成的。整个集团有六百名武装起来的蒙古人，一共约有一千人。[④]

昌加基尔族人又称“昌加基尔族通古斯人”（Тунгусы Чамчатирского рода），[⑤] 哈腊希里克亦称“涅尔琴斯克边界上的通古斯匪徒”。[⑥]《18 世纪中俄关系》所见，达兰贝子又写作“монгольцы, Чемчатырского рода Далай-Бесу”，[⑦] 即“蒙古人，昌加基尔族达赖贝子”。可知，两伙强盗均为昌加基尔族通古斯人。在《清实录》与满文档案中，该群体被称作“齐木齐格特人”。[⑧] 瓦西里耶夫认为，“达兰贝子作为中国臣民，不归蒙古汗管辖，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领主”，[⑨]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 1689–1916. Под общ. ред. В.С. Мясникова.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4. С.595.

② “清属蒙古人抢掠俄人牲畜物资清单”见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10–111 页，此件俄文本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T.VI. 1752–1765 / Отв. Ред. 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1. С.70–73；瓦西里耶夫征引之西伯利亚档案见《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51、153、154 页。

③ 参见 1752 г. ноября 7 – 1756 г. января 22. – Экстракт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еленгинского коменданта бригадира В.В. Якоби с монгольскими пограничными управителями о набегах 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еделы «Мунгаль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воров» и нанесенном ими ущербе за период с 7 ноября 1752 г. по 22 января 1756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 VI. С.102–126.

④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28、129 页。原文见 А.П.Васильев: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Том II, Чит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Войсковог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Забайк. каз.войска(1916г). С.94.

⑤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8 页。

⑥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51 页。

⑦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 VI. С.105.

⑧ А.П. 瓦西里耶夫著作中写作 Чамчатирская，《18 世纪中俄关系》文件与资料集第 6 卷中写作 Чемчатырского，词之主干 Чемча 则与满文中的 Cimci 相对应；另外，与满文中 Cimciget 相应的英文为 Chimchigit，又写作 Chimchagir，后者与“齐木齐格尔”译名相应，满语中 и 和 a 书写上只有长短区别，当由此产生语音偏误。

⑨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29 页。

说明了其身份之特殊性。雅科比给土谢图汗的信件中称“Кои были Далай Бесуева ведомства Цынцыгиры”,[①] 即“车臣汗所属达赖贝子”。《清实录》与满文档案所见，齐木齐格特人为车臣汗部贝子颜楚布多尔济属人。

中文文献关于齐木齐格特人较早之记载见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之《扎萨克一等台吉贡楚克列传》，其中提到旺舒克达尔扎袭札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二年，以同族扎萨克台吉沙克都尔扎布属图济格等煽齐木齐格特人遁俄罗斯且肆劫，命随尚书查克丹率兵缉之，无脱者”。[②] 满文档案与《清实录》所见，车臣汗部逃人皆称巴尔虎。如，雍正十年八月上谕中提到，“伊（车臣汗）部落贝子颜楚布多尔济等旗下巴尔虎等逃入俄罗斯，为俄罗斯拿获遣回后，复又纵其逃脱。此皆为车臣汗车布登班珠尔懦弱，不能管束属下所致”。[③]《清实录》载，巴尔虎人“潜逃鄂罗斯地方，彼处不容伊等入境，仍住我卡伦外窃取喀尔喀等什物”。[④] 从称谓上看，“巴尔呼凡数种，有称齐巴齐努特者”。[⑤] 满、汉文资料中的齐木齐格特之于巴尔虎，正如俄文资料中的昌加基尔族之于通古斯，除特别说明外，较少使用其确切称谓。如，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乾隆帝提到，“唯闻得我索伦、巴尔虎等亦有入俄国边界行抢之事”，[⑥] 此处巴尔虎指的正是齐木齐格特人。从档案资料来看，雍正九年至十一年多次出现车臣汗部巴尔虎人逃俄事件，雍正十二年为中方接收俄方遣返逃人的时间，而出逃之巴尔虎人亦出自车臣汗部颜楚布多尔济所属。可知，车臣汗部逃俄之巴尔虎人应该就是或至少包括较多齐木齐格特人。事后，除将首逃议罪外，出逃之喀尔喀蒙古人“交各该旗严加管束”，巴尔虎人“照各扎萨克前呈请之例”，安置于呼伦贝尔地方。[⑦]

车臣汗部不能约束属人的情况在乾隆朝依旧存在，仍是引起边务纠纷的主要原因。但齐木齐格特人从逃俄转为边境盗窃，当与之前逃俄未被接收有重要关系。与雍正年间所见逃人身份相同，作为盗匪之齐木齐格特人亦“原系喀尔喀贝子颜楚布多尔济属人”。[⑧] 乾隆帝提到，“朕因尔等不善经理游牧，以致盗贼肆行，特命大臣前往督缉”,[⑨] 除不善经理游牧外，车臣汗“部落内属人滋事，皆因德木楚克久在军营，未获经理所致”。[⑩] 除缺少弹压之外，清准战争期间中方边务空虚也为齐木齐格特人长期肆盗提供了条件。1755、1756 年，“当蒙古人同珲台吉们作战的时候，几伙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盗贼乘边防守备队减员之机，开始抢劫边界一带的蒙古居民和俄国居民”。[⑪] 对于中方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盗窃，雅科比认为是由于土谢图汗有意放纵盗贼，其主观意向之有无虽无法证实，但彼时喀尔喀蒙古因边界防御力量过于薄弱而无法平息匪患却是事实。从俄文资料来看，车臣汗也曾采取行动，但因彼时军队主要集结于清准边境，未能平定匪帮。[⑫] 又如,1756 年 6 月，与色楞格斯克地区相对的中方边境“卡伦人员均遭蒙古贼人扰害”，致使四十一人前往俄方卡伦躲避。[⑬]

“从 1751 年起，盗窃事件增加了，尤其是在没有设立栅栏的涅尔琴斯克边界上，主要是蒙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VI. С.114.

②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1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16 页。

③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1 卷，第 812 页。

④《清世宗实录》卷 126，雍正十年十二月辛酉。

⑤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1 辑，第 396 页。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16 页。

⑦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1 卷，第 847 页。

⑧《清高宗实录》卷 531，乾隆二十二年正月辛亥。

⑨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1 辑，第 384 页。

⑩《清高宗实录》卷 526，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午。

⑪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28 页。

⑫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31 页。

⑬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21 页。

古人行盗，使驻守涅尔琴斯克卡伦的通古斯人彻底破产”，[①]“1752 年，在没有设立卡伦的额尔古纳河沿岸，抢劫加剧了”。[②] 从地理范围上看，额尔古纳河沿岸盗案增多始于未设卡伦之处，与1727 年中俄划界遗留问题相关。虽然《恰克图条约》中提及“两国边界乃头等大事，决不可有勘视不到之处”，[③] 但额尔古纳河库克多波以东因存为“隙地”而未设卡伦。“据原先两国议定，其卡伦仅设至库库多博”，[④]“为自库克多波以远空旷处设卡伦会议时”，萨瓦称“因无察罕汗旨意，故伊不可担承此交涉事务，而返回俄国后，并未复文”，[⑤] 导致“事后相继滋生盗案”。[⑥] 事后对应盗窃开始增多的 1751、1752 年，没有设立卡伦的额尔古纳河沿岸则指库克多波以东地区。此外，从时间上看，盗匪之兴起还与当时喀尔喀地区自然环境恶化有关。1756 年，多尔济奏称喀尔喀部落“屡遭荒歉，无以糊口”。[⑦] 次年，乾隆帝提到，“喀尔喀等数年以来，屡与戎行，复被灾祲，生计较前拮据”。[⑧] 俄文资料记载，“由于当时整个蒙古地方发生了可怕的饥荒，饿死了很多蒙古人”。[⑨] 越界盗窃案件频发的 1756、1757 年，正是气候环境最为恶劣的阶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 1752 年之后额尔古纳河沿岸盗匪之兴起，还要从长时段考察昌加基尔族通古斯人，即巴尔虎中的齐木齐格特人在中俄两国之间的迁徙以及由此引起边务纠纷。瓦西里耶夫在著作中另提及，“在楚库河上游，居住着从涅尔琴斯克城下逃出的昌加基尔族通古斯人，他们既不依附于俄国，也不依附于中国”；[⑩]“在 1700 年，头人乌秋科（Шуленга-Учюко）（昌加基尔族）带了二十六个帐篷从捷列姆宾斯克城堡和叶拉文斯克城堡附近逃往蒙古。逃跑的人在楚河、缅札河和鄂嫩河上游放牧”。[⑪] 这两处提到的昌加基尔族人与乾隆年间肆出为盗的昌加基尔族盗匪是否有关，尚无确切证据。但由此可知，昌加基尔族人出现在中俄边界地区的时间可追溯到《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索诸中方史料，《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又翁古惕、敖都尔、齐木齐格尔、喀尔喀等足七百男丁，不知其台吉去向，返去时受鄂罗斯、昆都仑博硕克图侵扰，暂驻呼裕尔地面”。[⑫] 可知至少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即有齐木齐格特人散落于中方境内。又，康熙三十三年齐巴齐努特“塔布囊等避噶勒丹，携六百户奔附扎萨克阿哩雅所，而留五百户栖呼伦贝尔之乌棱地，无所依，谕旺扎勒白其母收之还”。[⑬]

以上关于齐木齐格特人的记载，与资料中见到的巴尔虎人（俄文资料中又称布里亚特人或塔布努特人）从俄方迁入中方境内的情况相符。《尼布楚条约》签订期间，即有布里亚特人强行脱离俄国统治。康熙二十九年俄方来文称，“据闻居我国周围地方向我纳税之蒙古人与布里亚特人，于本年均由尼布楚地方逃出，迁于库伦河附近之达赖湖地方”，[⑭] 中方以“并非在定约之后被我收纳之逃人”为由，拒绝予以遣返。[⑮] 此后，又有部分从俄国迁出并游牧于喀尔喀蒙古地方的

---

①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81 页。
②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82 页。
③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III.С.187.
④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05 页。
⑤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211 页。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09 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 519，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戊午。
⑧ 《清高宗实录》卷 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辛酉。
⑨ 尼古拉 · 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302 页。
⑩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8 页。
⑪ А.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20 页。
⑫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起各部来文档，转引自孔源：《17 世纪蒙古高原巴尔虎蒙古族的迁徙及其历史意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⑬ 包文汉、奇 · 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1 辑，第 396–397 页。
⑭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1 卷，第 179 页。
⑮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1 卷，第 175 页。

布里亚特人。俄方咨文提及，“据于二〇三年（即 1695 年）由他处获悉，达赖黄台吉于圣主之地方游牧。现与伊一同游牧居住之一千余布里亚特人，系我俄罗斯汗乌第地方之逋逃。伊等同谋拟于尼布楚一带行盗”。[①] 中方复文“我至圣皇帝，早已严令回归本国之喀尔喀，禁止侵扰俄罗斯国”。[②] 可知，该群体自出逃之始，即有劫掠俄国边境之意图，到了中方境内亦肆意劫掠。[③] 这与其身份有重要关系，康熙帝曾提到，“尼布潮等处，原系布拉忒、吴梁海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为业，人称为树中人”。[④] 史书中关于巴尔虎人盗窃的记载颇多。[⑤] 雍正二年，允禩等奏称“一切边界纠纷，均系住居两国边界之喀尔喀、布里亚特人所致”。[⑥] 此当为乾隆年间额尔古纳河沿岸盗案频发的重要历史背景。

综上，自《尼布楚条约》签署之后，即有包括齐木齐格特人在内的巴尔虎人回到清朝境内，驻扎于中俄边界地方。受平准战争的影响，雍正九年至十一年，贝子颜楚布多尔济属下之巴尔虎人，即《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提到的齐木齐格特人大量逃亡俄国，且在边界地区肆意劫掠，但遭到俄方遣返与中方缉捕。同样受清准战争影响，在缺少弹压以及边界防务空虚的情况下，乾隆十七年之后，颜楚布多尔济属下齐木齐格特人开始肆意盗窃俄方卡伦，至乾隆二十一、二十二年，大肆劫掠中俄边境。额尔古纳河库克多波以东未设卡伦之地以及喀尔喀地区气候恶化亦是影响齐木齐格特人肆盗边境的重要因素。

盗案增多后，俄方分别从地方与国家层面就禁止越界、抓捕盗贼以及按照《恰克图条约》第十条之规定予以赔偿等问题向中方提出交涉。俄文档案记载，自 1752 年起，俄国边境长官雅科比与土谢图汗斡齐赖巴图之间多次就“蒙古武装盗贼”问题展开交涉，但未取得积极进展；[⑦]“我准将雅果毕几次咨文尔驻乌尔辛地方之蒙古长官知照，而该长官不予处理，又不严管属下，随意进入我俄罗斯边界，仍旧盗窃。非但进入无卡伦之地，即使设有卡伦之地，亦常发生盗案。除不计我准将处前所咨文书外，继而又几次咨文尔土谢图汗。今年愈加扰乱，并多人结伙入界，其经我属通古斯卡伦营帐，如行大道也”。[⑧] 这完全符合瓦西里耶夫提到的，作为逃亡之盗匪属于中国臣民，但不归蒙古汗管辖的特殊身份。

除地方层面交涉外，枢密院咨文中亦就积案处理提出要求。乾隆十六年，理藩院致俄枢密院两封公函。[⑨] 枢密院复函两件，第二件是据伊尔库茨克副省长兰格（Л.Ланг）报告写成，文中指控蒙古边境卡伦长官和中方为审理案件派驻恰克图、祖鲁海图边城的界务官不能满足俄方受害者的要求，提出对俄方损失予以赔偿，派“真正的中国官员”即满洲官员根据条约审理边界纠纷和盗窃案件，在额尔古纳河附近及其他地方新设卡伦禁止越境。[⑩] 就俄方提出的要求来看，既涉及中段边界普通边民互盗引发的积案，也涉及东段边界匪帮越界劫掠事件。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1 卷，第 275 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1 卷，第 274 页。
③ “二十九年，以巴尔呼人肆劫，命尚书阿喇尼往缉，擒其酋，询知洪俄尔岱青及达赖宰桑为噶勒丹所掠，不获归，洪俄尔岱青兄子罕笃代领其众，诏罕笃携众入科尔沁界，附亲王沙津游牧。罕笃至，纵属肆劫，命阿喇尼遣之出界，其兄车布登乞留牧，谕饬属毋为盗。”包文汉、奇 · 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1 辑，第 406 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 200，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卯。
⑤ 除以上所引外，又，康熙二十一年车臣汗部“所属巴尔呼人私掠乌珠穆沁部界”。包文汉、奇 · 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1 辑，第 383 页。“谕以前此内地蒙古，盗窃马畜，以致喀尔喀、巴尔虎亦行报复，彼此互相盗窃不已。”《清圣祖实录》卷 97，康熙二十年九月辛未。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1 卷，第 668 页。
⑦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VI. С.102-126.
⑧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09 页。
⑨ 内容分别涉及将理藩院印信“古满文”变更为新满文、对俄方送还从准噶尔越境进入俄国的中国人“吴世义”表示感谢，参见尼古拉 · 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87 页。
⑩ 尼古拉 · 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88 页。

清廷在询问亲王额林沁多尔济后，对俄方来文进行了逐项批驳。首先，“此等处原并未设卡，多年无事。如立卡，官员兵丁又将加赋，故毋庸议”。其次，“恰克图未完之一百二十项案，皆系互相偷盗欠债之项，乃逐年重迭之案，并非至今未完之案。而其中有应不议之案，亦有业经办竣而伊等复更翻索取之案。今果应办者，不过近十项”。按照规定，赔罚需要提供踪迹，俄方提交案件中“有交踪迹者，亦有未交踪迹者，计算甚不明”，而中方应罚取之牲畜，俄方亦未明白偿还。[①] 关于派遣满洲官员，中方答复由理藩院“饬令该办理界务之王等，应委派贤能台吉官员”秉公完结积案。1754 年，中方“派往恰克图、苏鲁海图二处之办事官员，仍系蒙古人”，“惟办理数件新盗窃案件，其余未完旧事，仍搁置不办”。[②] 事后，俄方来文追索一百一十件旧案。[③] 俄方虽从国家层面提出盗案交涉，但中方仍根据条约规定，由地方层面边务人员进行处理。因额尔古纳河沿岸设卡、盗案交涉未取得进展，加之边界防务空虚以及气候环境恶化等因素，匪帮越界盗窃事件愈演愈烈。1756、1757 年盗匪开始在整个中俄边界上肆意盗窃。[④]

乾隆二十一年，匪帮大规模越界盗窃招致俄属乃玛尔人的报复，“1756 年末，被不断抢劫激怒了的驻守卡伦的涅尔琴斯克通古斯人和加入俄国籍的人，开始攻打蒙古人以示报复。开拉・苏台卡伦的通古斯人三次窜入蒙古境内抢劫。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击，是杜鲁勒圭卡伦的通古斯人在遭到蒙古人春季进攻之后进行的”。[⑤] 此处提到的三次入境抢劫对应满文档案中记载的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夜、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三日夜三次越界劫掠事件。奏折中称“进犯牧场”，“进犯我卡伦地方”，“大股贼人来犯”。[⑥] 从相关描述来看，乃玛尔人大规模持械越界是有目的、有计划、有分工的集体劫掠行为。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击时间在春季，对应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的越界劫掠，混战中“杀奈玛尔三十一人”。[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盗匪被平定之后，乾隆二十三年发生的乃玛尔人越界盗窃由越界打猎引起。据相关人员供述，俄方三十人欲渡额尔古纳河前往根河打猎，“经未设卡伦之地，入尔索伦、巴尔虎牧场，盗马三十七匹。当至特勒布尔河时，由尔追兵赶来，彼此射战”。[⑧] 乾隆二十四年乃玛尔人越界则因俄方递交踪迹时中方人员拒收，“六九十名通古斯人等极为恼怒，故至尔处，大举盗窃”。[⑨]

“第一批抢劫发生于 1755 年末，但是到了 1756 年初，抢劫更加猖獗了”，[⑩] 盗窃次数增多的同时，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1756 年初，一伙蒙古强盗袭击了涅尔琴斯克边界上的几个卡伦”；[⑪] 1756 年 6 月，色楞格斯克边界上也开始发生抢劫，直至“中国人顺利解决了蒙古问题，平定了动荡的蒙古，遂于 1758 年，采取了一系列绥靖边界地区的措施。在俄国边界上，他们根除了匪帮——哈腊希里克和昌加基尔族盗匪，然后加强了边防卫戍队（‘蒙古兵’）”。[⑫]

中方档案与史料中，有较多关于剿灭齐木齐格特人的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贝勒颜楚布多尔济奏称，“伊游牧地方所有齐木齐格特人等，肆出为匪，请暂移至阿巴噶地方居住”，乾隆帝下令“著即严行查拿正法，以昭炯戒”。[⑬] 后因车臣汗嘛呢巴达喇患病未及会办，齐木齐格特人等

---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53、54 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08 页。
③ 厉声等主编:《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第 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3–115 页。
④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09 页。
⑤ A.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54 页。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71–72 页。
⑦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16 页。
⑧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64 页。
⑨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81 页。
⑩ A.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28 页。
⑪ A.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29 页。
⑫ A.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76 页。
⑬《清高宗实录》卷 525，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壬午。

“亦暂行慰谕，缓筹办理”。[①] 十二月，拿获青衮扎布之后，派纳木扎勒前往，会同巴雅尔什第、德木楚克等“将此项人等严行办理”，[②]要求“查出为首倡乱之人，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余亦无庸交该扎萨克管束，即赏给喀尔喀内曾经效力之人为奴”，部落内“似此为匪之人”亦“严加惩治，不得稍事姑息”。[③]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瑚图灵阿奏闻剿办齐木齐格特人情形；[④] 因部分齐木齐格特人逃往呼伦贝尔地方，乾隆帝传谕绰勒多等，“务即遣兵查拿，将贼首解送京师治罪，其情罪较重者，即在彼处正法，余俱赏给索伦、巴尔虎等为奴，断不得少事姑息”。[⑤] 其后，清廷将齐木齐格特人移住布特哈地方纳贡，[⑥] 之后则再无关于齐木齐格特人盗窃之记载。

三、地方层面与国家层面中的积案交涉

如上所述，早期积案纠纷皆由地方层面进行交涉。1756 年匪帮越界劫掠招致乃玛尔人越界报复之后，盗案交涉上升到国家层面。乾隆二十一年，中方派遣钦差、贝子瑚图灵阿以及都统多尔济等前往恰克图，会同俄方调查乃玛尔人持械越界劫掠案件。但雅科比称未接到萨纳特衙门授权，拒绝前往祖鲁图海。中方人员撤回后，由理藩院“照例移文俄罗斯萨纳特衙门”进行交涉。[⑦]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俄信使布拉季谢夫（В.Ф.Братищев）来华，提交“清属蒙古人”即匪帮盗窃案件清单。关于盗案处理，俄方提出的要求基本与乾隆十六年所提相同，即赔偿损失，派遣满洲大臣处理积案，额尔古纳河沿岸增设卡伦。[⑧] 中方要求俄方与新派遣管理俄罗斯事务的边务大臣桑斋多尔济会同办理。彼时，中方关注的是阿睦尔撒纳与准噶尔逃人，乾隆帝认为乃玛尔人盗窃案“委实不必遣大臣会议，只派官员会同办理即可”。[⑨]

乾隆二十三年，根据理藩院指示，桑斋多尔济派出公宫格顿丹前往恰克图办理积案，但俄方并未遣派干练能承事者，双方虽办竣大半事务，“惟中尉等不能承担事务，故仍余几项事务未得办结”，雅科比所派大尉“又将更翻原取消之事之处，咨行准将”，却迟迟未得复文。[⑩] 因此，桑斋多尔济与雅科比约定次年亲自在恰克图进行交涉。随着交涉级别的提高，会议内容也更加广泛，桑斋多尔济奏称，拟将“近年所存未结之新旧事项，皆彻底尽行议明，予以办结”。[⑪] 俄文资料载，“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审查和解决双方一切有关边境事务方面的问题”。[⑫] 除逃人问题外，还涉及俄边界树栅、恰克图征税以及积案处理三个方面。

关于积案交涉，俄文资料记载“中国人希望和坚决要求取消双方 1757 年以前的一切有争议的案件，而只审理和解决自该年起以后发生的此类事件。但由于 1757 年以前俄方的要求较中国方面为多，因而雅科比未同意此项建议”。除抵销全部积案外，中方还提出“或者只对色楞格斯克边界所发生的一切争端双方不再置议”，即抵销边民互盗案件，只处理匪帮越界劫掠案件，亦遭到雅科比拒绝，“因为如照此办理，不仅有失公平，其结果反而给俄方造成负担，它的损失要

① 《清高宗实录》卷 526，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午。

② 《清高宗实录》卷 529，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乙卯。

③ 《清高宗实录》卷 531，乾隆二十二年正月辛亥。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喀喇沁贝子瑚图灵阿，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76–1631–053。

⑤ 《清高宗实录》卷 535，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丙午。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喀喇沁贝子瑚图灵阿，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76–1634–016。

⑦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78 页。

⑧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08、109 页。

⑨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23 页。

⑩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55 页。

⑪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21 页。

⑫ 尼古拉 · 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325 页。

超过蒙方”。[①] 此外，双方在赔罚数额上也存在纠纷：“我准将先将双方应赔偿物件档册，按色楞格地方所办之例计马畜数额，有多出之额，应赔偿与谁，尔界长官不予理睬。伊等之意，既然马畜均定有数额，则将物件亦定数额。然定此数额时，非但多估而对物件，又折高价。物件折价既高，以致诸事碍难办理。”[②]

盗匪劫掠引起的积案与边民互盗引起的积案是否应该共同处理，双方存在较大分歧。这与条约文本差异引起的边界树栅、恰克图征税有所不同。中方是否应为匪帮盗窃承担责任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起初，清廷并不清楚其身份。乾隆二十一年，中方咨俄文书中提到，“我土谢图汗部属下之人，原生计稍有艰苦，加之有歹人混入其中，偷盗之事仍有发生，今已明饬查办”。[③] 次年，乾隆帝提到，“唯闻得我索伦、巴尔虎等亦有入俄国边界行抢之事，此亦理应严禁。如此，边界方得廓清。否则，惟防对方之人，而我人则随意越界，终非理也”。[④] 实际情况则如瓦西里耶夫所言，达兰贝子不归蒙古汗管辖，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领主。

因积案纠纷未能解决，理藩院与萨纳特衙门相互行文指责。乾隆二十四年，理藩院咨文中提到，“商议特古斯肯之事时，尔准将并非秉公办理此事。惟推诿迟延，应双方抵销、完结之事，并不爽快办理。且巧言求取便宜，亦甚为小气，竟非办事之理”。[⑤] 俄方则予以反驳，“据我等所知，该准将凡处理边界事务，均按理允协完结，并无迟延之弊。该迟延者，均出自尔办理界务之将军、王等也”。[⑥] 乾隆二十五年，理藩院要求萨纳特衙门派遣大员决断纠纷。[⑦] 俄方复文称雅科比是“边界上主要的全权指挥官”，可负责边界树栅交涉，关于恰克图征税与边界积案，1760 年 6 月 13 日的公函中已详尽写明，问题未能解决“完全是由于中国边疆大臣无理阻难和固执己见”，[⑧] 提出“此等边界事宜，均可各饬令办理边务长官，令彼等毋得迟误推诿，秉公速结”。[⑨]

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乾隆帝降谕边务大臣诺木浑前往恰克图再与雅科比举行会议，交涉之前未能解决的立栅、收税、积案三项问题。国家层面文书往来中即存在分歧，此次恰克图边界交涉亦未取得任何进展。满文资料记载，“逐项会议特古斯肯事务之时，尔（俄方）总希图侥幸，将拿获盗贼与否及交付踪迹与否等双方应承担之不明事项，和先前业经取消完结之旧事，复又更翻塞入，狡赖索赔，而我等应更翻不予取消之清楚事项，尔等则俱予取消”，“反复声言，不计拿获盗贼与否，尔俄方之事皆甚明白，而我方之事皆不明白，应予取消”。[⑩] 中方再次提出，“双方提出的盗窃和抢劫案件，不必详细调查，应悉数予以撤销，双方不得提出任何要求”，俄方仍拒绝接受此提议。另外，取消征税问题亦影响了积案处理。雅科比不同意取消征税，进而也不同意拆除栅栏、抵销积案，“以免在一个要求上让步，使中国人因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傲起来，或者今后要提出更多的要求”。[⑪]

乾隆二十七年恰克图边界会议是理藩院与萨纳特衙门互相行文后召开，会议无果后中方暂时关闭了恰克图贸易，要求俄方“务派委晓事能承办事务之大员”，按条约规定处理未完结事项，否

---

①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325−326 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09 页。
③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74 页。
④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16 页。
⑤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76 页。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09 页。
⑦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04 页。
⑧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337 页。
⑨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39 页。
⑩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53、254 页。
⑪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346 页。

则将永远停止贸易。① 作为回应，俄方于乾隆二十八年派遣克罗波托夫来华。据中方所言，俄方来文声称“若将边界事务交伊等办理，定可速结”，但中方问及积案处理事宜时，“伊称尔萨纳特衙门并未交付此事”。② 同年八月，办事大臣富德再赴恰克图与雅科比举行会议，由于恰克图贸易仍在进行，俄方对解决相关纠纷并不积极。富德提出撤商建议，“伊如不请求，我等不仅不通商，不但原特古斯肯事，即新踪迹，亦俱不管。我等惟严令我卡伦，如此不理睬伊等一次，伊等定主动前来也”。③ 至此，中方逐渐撤回全部商人并于乾隆二十九年彻底闭关。1768 年，俄方再次派遣克罗波托夫来华，在答复抵销积案的前提下，双方重新拟定《恰克图条约》第十条，并与其他议定之若干款项共同列于《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中俄积案交涉遂告完结。

四、积案交涉善后问题

边民互盗以及盗匪劫掠造成的积案是引起 1768 年重拟《恰克图条约》第十条的主要原因。《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关于积案处理与制定重拟第十条的说明中提到：

> 双方现有之旧案，停止互议，逋逃俱不更翻。从前十一款内之第十款所定，裁断双方边民盗窃、脱逃之事，既然不明，此项即属无用，可遵行现在议定之例。自议以后，双方各严管所属之人，断不可任意妄加滋生恶乱之事；边界头目每年办理实在之事时，见指交踪迹，即秉公作速完结，谁若耽延、推诿，妄加狡赖，即照各处之例治罪。今巡查盗贼，指交踪迹，对越界之人如何治罪之处，后来业经写上……④

旧案停止互议属于“契约性条约”，重拟第十条则属于“造法性条约”。⑤ 所谓旧案，既包括普通边民互盗之积案，也包括盗匪劫掠引起的积案。“双方各严管所属之人”主要针对喀尔喀蒙古与乃玛尔人而言。“指交踪迹，即秉公作速完结”是处理盗案的关键，“原定双方如盗窃牲畜案件，以所交踪迹为凭”，⑥ 然而《恰克图条约》第十条中并无关于交付踪迹的规定，1768 年之前“交付踪迹”仍是“按照习惯”。⑦ 因此交涉中存在卡伦人员拒绝接收踪迹的行为，而条约并无相关处理办法。乾隆二十四年乃玛尔人越界劫掠案中，中方卡伦人员交付踪迹，俄方人员“推诿不受”，理藩院责以“甚毁友好之道”而非违背条约。⑧ 同年，俄方交付遗失马匹踪迹，中方卡伦人员未予接收，招致俄属通古斯人大举越界盗窃以为报复，此事件之后，“尔方对我方通古斯人等在尔处行窃极为憎恨，才不愿交踪迹办理”。⑨

按照条约规定，递交踪迹后，要缉捕盗贼才能按照规定进行赔罚，“并未规定交付踪迹承认之后，即偿还牲畜”。⑩ 清准战争期间，土谢图汗、车臣汗部以及俄边界长官均无力捉拿齐木齐格特人，赔罚问题无法解决。较之《恰克图条约》第十条，重拟之第十条把交付踪迹列入条约，将习惯变成了法律，拒收踪迹按各自国内法进行惩处。又因踪迹易于消失，遂规定“将看视之处缮写文凭，并盖手记”，以此作为赔罚和会审的依据。盗案交涉中，边界人员互相交付踪迹、领取手书后限期拿获，“若到期未能查获，则报管理边界头目，严惩不奋力查拿之官兵，照盗一

---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262 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295 页。
③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301 页。
④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533 页。
⑤ 参见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66 页。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54 页。
⑦ A.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81 页。
⑧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81 页。
⑨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281 页。
⑩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261 页。

罚十之例，令伊等摊派偿还”，[1] 避免了接收踪迹但无法结案的现象。

盗匪兴起于额尔古纳河库克多波以东之后，俄方迭次行文要求增设卡伦。[2]1757 年布拉季谢夫来华使命中包括，“力求改变两国边境事务中所发生的混乱状况，制止蒙古人任意犯境并欺凌俄国边民，为此，应力请中方在没有卡伦的地方设置卡伦”。[3] 俄文资料记载，“俄国向中国建议在那里设立卡伦。此议遭到中国的拒绝，借口是额尔古纳河地区还没有划界。中国人回答说如果俄国想在那里建立新卡伦，那么，需要签订新的条约”。[4] 理藩院复文中提到，“若于此处设卡，务须在明确议定之后方可”，而中方提出的议定程序较为复杂，[5] 此事遂拖延起来。由于盗案不断发生，俄国单方面增设内卡后又沿额尔古纳河下游西北岸之额尔楞古、卓尔坤、布鲁、布尔珠、波尔图鲁、萨拉布齐增设六卡。次年，中方也在额尔古纳河东南岸相对之处，即库克多波以东增设六处卡伦，[6] 与原有六卡共同构成额尔古纳河沿岸十二卡。

除报复盗匪外，1756、1757 年乃玛尔人大规模越界劫掠能够得逞也与中方在额尔古纳河沿岸防御力量薄弱有关，此亦由当时正在进行的平准战争引起。乾隆二十二年理藩院咨文提到，“去年尔属奈玛尔人趁我索伦人从军之际，擅自潜入呼伦贝尔界”。[7] 盗案发生后，黑龙江将军绰尔多奏请“由乌里雅苏台撤回之呼伦贝尔兵丁中，简选五百，分驻各卡，以防俄罗斯奈玛尔人”。[8] 乾隆二十三年，军机处咨文称，“于俄罗斯边界设卡，特为防俄罗斯入界行盗，关系甚重”，因车臣汗部遭灾停派该部之人，“其缺派索伦、巴尔虎兵丁及土谢图汗部之喀尔喀兵补驻”。[9] 此外，土谢图汗部与黑龙江将军还分别派出两百包衣兵丁驻守卡伦，专门防御乃玛尔人。[10] 乾隆二十五年乃玛尔人越界事件中，俄方十六人被斩杀，奏报中称“惟此次拿获击杀之”，并行文告知俄方，若俄属乃玛尔人“仍随意越入我界，妄意为盗抢劫，则被我卡伦官兵及巡逻官兵拿获后，仍旧照此办理”。[11] 之后再未见乃玛尔人大规模持械越界的记载。

俄方亦借此加强了边界防御。匪帮盗窃使俄方“边境上的通古斯人遭到彻底的破产，在阿巴该图卡伦到色楞格斯克卡伦之间九百二十一俄里的地段上（十四个卡伦）的蒙古守备队都跑到内地放牧去了，撇下自己的哨所无人看守”。[12] 因未得到土谢图汗的积极回复，“雅科比被迫自己采取措施：1756 年，在涅尔琴斯克边界和色楞格斯克边界上，他派了特别部队（‘异族人的队伍’)”。[13] 中俄边界防务增强之后，重拟之第十条中“双方各严管所属之人”才得以实现。

此外，通过派遣库伦办事大臣，中方国家层面实现了对地方层面边务交涉的掌控与监督。《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为处理边务小事，地方层面之间可以相互行文，但俄方在关于递送行文迟误的回复中提及，“尤其是在必要情况下，允许他们（即库伦的蒙古当局）与俄国边防长官直接通函，这样可以避免双方利益遭受损失”。[14] 这表明喀尔喀蒙古与俄边界头目之间的文书往来受到了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533 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40 页。
③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97 页。
④ A.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82 页。
⑤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05 页。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10 页。
⑦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04 页。
⑧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16 页。
⑨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35 页。
⑩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87–188 页。
⑪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218 页。
⑫ A.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29 页。
⑬ A.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 2 卷，第 132 页。
⑭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35 页。

清廷的限制。① 自 1757 年桑斋多尔济赴库伦办事之后，地方层面的咨俄文书必须经过乾隆帝与理藩院的审阅、修改才能发出，理藩院咨俄枢密院文中提及，“大中国之例，并不可与外藩相比，办理或咨行诸事，若无朕旨，臣工并无擅自区处之权”。② 办事大臣瑚图灵阿咨俄边界头目时亦曾提到，“我大清国之例，我等办理边务人员，凡事皆须遵我院之命而行，不得擅自行文”。③ 如此即与清朝“人臣无外交”体制相合。之后发生的引起后两次恰克图闭关的费约多尔与乌拉尔斋案交涉中，库伦办事大臣的咨文均先呈交乾隆帝与理藩院审阅。通过文书制度的具体规定，地方层面交涉被纳入国家层面的掌握与监督之下，完善了条约的公正执行问题。需要库伦办事大臣层面解决的边务纠纷，必须汇报国家层面中的理藩院，并根据乾隆帝的指示进行处理。至于边务交涉中因缺乏证据而无法处理的失物、盗窃等小事，乾隆二十九年之后，统纳入“特古斯肯”档，以备查询，并于年终进行汇报，实现了地方层面与国家层面在边务处理上的合理协调。

五、结语

《恰克图条约》初步奠定了国家与地方层面对等交涉并明确了边界盗案交涉的法律基础。按照条约规定，地方层面负责盗案交涉，由于俄方认为中方地方层面人员办事不公，遂于国家层面交涉中提出抗议，但遭到中方拒绝。除法律条款不完善以及难以确保条约公正执行外，清准战争是影响中俄边界越界盗窃案件频发的主要外部因素。自《尼布楚条约》签署之后，即有包括齐木齐格特人在内的巴尔虎人从俄方回到清朝境内，驻扎于中俄边界地方。受清准战争的影响，雍正十年前后，颜楚布多尔济属下之齐木齐格特人大量逃亡俄国，且在边界地区肆意劫掠，但很快遭到俄方遣返以及中方缉捕。同样受平准战争影响，在缺少弹压以及边界防务空虚的情况下，乾隆十七年之后，颜楚布多尔济属下齐木齐格特人，即俄文资料中的“昌加基尔族通古斯盗匪”，开始肆意盗窃俄方卡伦，至乾隆二十一、二十二年，大肆劫掠中俄边境。齐木齐格特人之所以由逃俄转向盗窃俄方边界卡伦，当与雍正年间逃人遭到遣返，以及盗窃喀尔喀边境遭到缉捕有重要关系。另外，额尔古纳河库克多波以东未设卡之“隙地”，恰为这些出逃的齐木齐格特人提供了重要生存空间，而喀尔喀地区气候恶化，亦是促使其肆盗边界的重要因素。

齐木齐格特人大肆劫掠俄方边境卡伦，招致俄属乃玛尔人多次越界劫掠以为报复，成为自《恰克图条约》签署之后，中俄边界最为混乱的时期。中方虽在 1757 年平定了匪帮，但盗窃引起的积案是否应该与边民互盗引起的积案同时抵销，中俄双方始终未能议决，交涉逐渐从地方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1768 年双方抵销积案并重拟《恰克图条约》第十条，为边务交涉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法律基础。此外，双方还在额尔古纳河分别新设六个卡伦，并各自完善了边务防御体系，中方将地方层面交涉置于国家层面监督之下，从而部分地解决了《恰克图条约》的不完善性。从后两次恰克图闭关与《恰克图市约》之签署来看，地方层面人员对等交涉、国内法与条约之间的优先适用等问题尚未解决，然相关议题已超出了本文论述范畴，仍需另外撰文予以专门讨论。

References

Chen Kaike. “E zong lingshi yu qing jin haiguandao——cong keben shiliao kan tongzhi nianjian difang cengmian de zhonge jiaoshe” (The Russian Consul General and the Qing Customs Intendant at Tianjin: Sino-Russian negotiations at the local level as seen in Block-printed Materials). *Zhongguo shehui kexue* (Social

① 出于对喀尔喀蒙古的提防，“清政府一直对俄罗斯与蒙古之间的边界往来和俄罗斯在喀尔喀地区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参见齐米特道尔吉耶夫：《蒙古诸部与俄罗斯（17—18 世纪）》，范丽君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9 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90 页。

③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464 页。

Sciences in China)4(2012).

Kurtz, B. G.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Kharkiv: State Publishing House of Ukraine, 1929.

Li Haopei. *Guojifa de gainian he yuanyuan* (The concept and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Guiyang: Guizhou renmin chubanshe, 1994.

Li Qifang. *Zhonge guanxi shi*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Taipei: Lianjing chubanshe, 2000.

Li Yongqing and Su Fenglin. “Qianlong nianjian qiaketu maoyi sanci biguan bianxi”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closures of Kyakhta trad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Lishi dangan (Historical Archives) 3 (1983).

Ming Ji. *Zhonge guanxi shi*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Taipei: Sanmin chubanshe, 2006.

Myasnikov, V. S.：*Russian-Chinese Treaty and Legal Acts, 1689–1916.* Moscow: Monuments of Historical Thought, 2004.

Tsimidt Dorzhiev. *Menggu zhubu yu eluosi 17—18shiji* (Mongolian tribes and Russia: 17th–18th centuries). Hohhot: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2009.

Vasiliev, A. P. *Wai beijiaer de gesake shigang di 2 juan,* (The Cossacks of Transbaikalia: A historical outline Volume I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1979.

YANAGISAWA Akira：*Some Remarks on the “Addendum to the Treaty of Kiakhta”in 1768, The 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 (63)2005.

Zhang Weihua, and Sun Xi. *Qingqianqi zhonge guanxi*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Jinan: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1997.

Zhukov, E. 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Far East. Book 1: From the Late 16th Century to 1917.* Moscow: Thought Publishing House, 1973.

The Settlement of Unresolved Border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Kyakhta

QIAO Weix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qiaoweixing@ucass.edu.cn)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Qing-Zunghar Wars and amid weakened military suppression and porous border defenses, the Chimchigit people under Yanchub Dorji of the house of Setsen khan in khalkha, known in Russian sources as the Chimchagir Tungus bandits, emerged after 1752 in the unguarded area east of Kukedobo on the Argun River. They frequently raided Russian border outposts and escalated their plundering along the Sino-Russian border by 1756. This provoked retaliatory cross-border raids by the Russian-aligned Naiman people. Although the Qing suppressed the bandits in 1757, the long-standing issues of border theft and bandit raids remained unresolve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1768, both parties agreed to offset the disputes and renegotiated Article 10 of the Treaty of Kyakhta, establishing a more robust legal framework for border affairs. Additionally, new border outposts were added, defenses were strengthened, and the Qing integrated local-level negotiations into state-level oversight, partially addressing the treaty’s earlier inadequacies.

Keywords: unresolved border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reaty of Kyakhta, Chimchigit (Chimchagir), Naiman people